

兄弟阅墙： 中德在 1963 年统社党六大 前后的争斗及其影响

陈 弢

摘 要：1963 年年初的民主德国统社党六大是中德两党关系公开破裂的标志。统社党的对华政策并非是完全听命于苏共，而是与其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同中共存在严重分歧有关。由于完全忽视了苏德之间的区别和民主德国的虚弱性，中共采取了强硬斗争的态度。中德两党关系的破裂不仅对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还有利于原本对中德来往有所疑虑的苏联，加强了苏共与统社党的合作。

关键词：中国；民主德国；统社党六大；苏联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K517；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5)04-0121-17

1949 年 10 月相继成立的新中国和民主德国，分别位于社会主义阵营东西两侧的前哨，是有着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兄弟国家。随着 50 年代中国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发展，两国两党的关系也在 50 年代中后期迎来了黄金阶段。双方在统一问题、获取国际承认和经贸等领域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合作。中国被民主德国执政党统社党高层视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第二根支柱”。^①

进入 60 年代后，双方的党际及国家关系出现恶化并逐步转为公开论战和完全

^① Siegfried Bock, „Der Freundschaftsvertrag von 1955“, in Joachim 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S. 35.

破裂。在目前国际冷战史的研究中,1963年初的统社党六大被视作中共与统社党及民主德国关系发展的“决定性转折点”和“公开破裂”的标志,同时也是显示国际共运分裂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对六大的具体过程、统社党对华政策有别于苏共的复杂性,以及尤为重要的中共在六大前后对统社党和大会的态度进行探讨。^①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开放,中国学者利用中方的档案材料第一次披露了中共在此次会议前后对苏东阵营政策的变化,但没对中苏论战下中德关系的特征和中国的对德政策进行单独考察。^②而国内有关中德关系史的专门研究,则把双方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于统社党一方,并认为六大期间及其后双方矛盾的激化是在于民主德国“追随苏联,对中方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③

本文在综合利用中德两国一手档案,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口述访谈和近年来出版的苏联档案汇编的基础上,力求尽量客观地考察六大前后中德双方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争斗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背后所体现的双方关系和中德两党有关政策的重要特征。

一、统社党六大召开前的中德关系

50年代中后期中德双方不仅在经贸和国家关系领域存在紧密合作,民主德国统社党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教育和经济等领域还学习借鉴了中共的经验,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受到统社党高层的公开赞扬^④,以致外界将双方的接近称为“北京-潘科轴心”。^⑤然而到60年代初,随着中德双方国内建设都出现严重

^① 近年来西方学界利用德文一手档案对统社党六大在中德关系史上意义的论述,参见 Nicole Stube-Berries, „Grundzüge der Beziehungen DDR-VR China, 1956-1969“, in Joachim 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S. 119; 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S. 141; Claudie Gardet, *Les relation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1949-1989*, Bern: Peter Lang, 2000, pp. 154-160; Martina Wobst, *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 China 1949-1990*, Münster: LIT Verlag, 2004, S. 63-64. 其他的有关研究,参见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28-236.

^② 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5-128页。

^③ 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19-121页。

^④ 主要可参见党内二号人物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讲话:《在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持:格罗提渥在德驻华大使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9年1月28日,第4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Hermann Matern)的讲话:《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万岁:在首都各界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第2版。

^⑤ 对此问题有关的研究,请参见 M. J. Essling, “East Germany: Peking-Pankow Axis?”, *The China Quarterly*, 3/1960, pp. 85-88; Hemen Ray, „Die Ideologische Achse Peking-Pankow“, *Außenpolitik*, 11, 1960, S. 819-825. 潘科(Pankow)是柏林的一个行政区,民主德国时期这里是统社党的政治中心——笔者注。

问题,以及民主德国发生大规模人员外逃的情况,统社党开始转变政策,公开反对中共向民主德国输出人民公社等经验。统社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在 1960 年 6 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出,(中共的经验输出)会挑起民主德国国内和党内的争论,“民主德国处在开放的边境下,对这种事情一天也不能忍受。”^①此外,在中苏分歧发展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高层还做出了在与中共争论前要先同苏共商量的指示。^②紧接着,1961 年 10 月贺龙率领的出席民主德国建国 12 周年庆典的中国代表团,也在访问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冷遇和刁难,使双方关系明显恶化。^③

统社党对中共态度的逐渐冷淡与其在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上与中共的不同看法有关。在内政上,60 年代初期统社党高层对解决民主德国的大规模人员外逃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六大上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统社党试图通过改革,强调物质刺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提升企业和基层的权力,增加灵活性,最终达到国内的政治稳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包括埃里希·阿佩尔(Erich Apel)和君特·米塔格(Günter Mittag)等诸多党内经济和技术问题专家越来越为统社党高层看重。^④

在外交领域,统社党在南斯拉夫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也和中共存在严重分歧。为了打破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统社党倾向于和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南斯拉夫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发起国,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尤为统社党所重视。50 年代末期,民主德国与被中共批评为“修正主义”典型的南斯拉夫建立的外交关系,是其第一次与苏联阵营之外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具有重大意义。^⑤因此统社党也邀请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六大。而印度作为民主德国争取更大范围的国际承认的对象,在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也越发为民主德国所重视。但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使得民主德国在印度和作为社会主义兄弟的中国之间感到“进退失据”,并受到了双方的指责,其

① Rede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Meinungsaustausches zwischen den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der sozialistischen Länder über Fragen der internationalen Lage”, SAPMO-BArch, JIV 2/202/272, in 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 118-119.

②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960 年 8 月 25 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年版,第 190-191 页。

③ 此访的具体过程请参见童欣:《1961 年贺龙访民主德国——两国关系恶化中的关键一环》,载李丹慧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7 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版,第 104-131 页,这里第 112-115 页。

④ Hermann Weber, *Geschichte der DDR*,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237.

⑤ Hermann Wentker, *Außenpolitik in engen Grenzen, Die DDR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1949-1989*, München:Oldenbourg Verlag, 2007, S. 164-165.

外交因而陷入严重矛盾之中。^①

与此同时,中共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却日益激进,反修防修逐渐成为党的工作重点。这包括在国内重提阶级斗争,批判党内由于反思“大跃进”和大饥荒所进行的改革措施。而在国际政治上批判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采取缓和、不要四面树敌及防治中苏斗争继续尖锐下去等建议。^②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对统社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估几乎完全是负面和批判性的。1962年11月20日,中国驻德使馆对统社党在六大会议前发布的几份文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对统社党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份分析报告指出,统社党对内“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调和,强调国家机关主要做经济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思想改造,仍迷信物质刺激,不强调人的因素,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和物质刺激,并迷信经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东德人收入高就可以稳住东德人心,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③

在这份文件看来,统社党强调物质刺激是与其“不提自力更生、依赖外援”联系在一起,“统社党提出的发展民族经济口号是民族经济其名,附庸经济其实”,“从一味依赖资本主义到依赖修正主义,日子也并不好过,仍然脱不了寄人篱下的处境”,而“统社党文件中所提的集体领导问题,也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做法”。^④

对于统社党的对外政策,这份文件认为,“统社党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是跟随苏联片面地追求和平共处,害怕紧张,害怕战争,所以在东西德关系上不是高举革命、斗争和重新统一德国的旗帜,而是采取关门建设社会主义。与西德长期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放弃领导西德革命斗争的错误路线”。报告还批评了统社党对苏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其“花很大篇幅来吹捧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意义,好话都被说尽了”,而“德南关系几年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勾结得更紧密了”。总之,此份报告认为“德党是在越变越坏,在进一步贯彻执行苏共 22 大的路线,在修正主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修正主义的观点越来越全面、系统”。基于这种情况,驻德使馆指出,“六大会议上将会出现一个大肆攻击马列主义、反华、反阿的浪潮。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⑤

在中共应对统社党六大策略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

① 葛君:《民主德国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及其演变》,载李丹慧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7辑,第89-102页,这里第101-102页。

② 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23-148页。

③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研究室:《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文件的一些初步看法》,1962年11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④ 同上。

⑤ 同上。

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大都由刘少奇主持，但一些重要决定都得和正在杭州疗养的毛泽东“通电话，以征求他的意见”。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公开发表的反修文章大都事先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①

此时的毛泽东在应对东欧各国党代会上出现的对中共批判浪潮时，表现出了公开斗争和对抗的强硬立场，并亲自为出席六大的代表团定下了不要害怕斗争的基调。1963 年 1 月 6 日至 7 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伍修权^②、赵毅敏^③等人的情况汇报，并当着伍、赵和外国宾客的面表示，“依靠外国才能制定自己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的党绝不会成功，哪怕是小国小党也是如此”，“如果对方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④ 他本人在这段时期内写作的《七律·冬云》（1962 年 12 月 26 日）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 年 1 月 8 日）两首诗词，将统社党在内的东欧共产党比作嗡嗡叫的“苍蝇”，是在“蚍蜉撼树”和要被完全加以“扫除”的“害虫”。这种斗争情绪直接在参加统社党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中体现了出来。

中共中央在 1962 年年底决定赴德代表团将由 9 人组成，包括团长伍修权，团员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熊复等，同时还派出俄文（阎明复）、德文（宦国英和梅兆荣）及英文和西班牙文翻译前往。^⑤ 考虑到在统社党六大上斗争的重要性（赫鲁晓夫将亲自参加），毛泽东还在 1963 年 1 月 8 日晚上亲自向周恩来指示，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团还要再增加几名秀才。^⑥

二、统社党六大上的争斗

统社党六大定于 1963 年 1 月 15 日至 19 日在东柏林召开。为了不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影响到会议的正常召开，乌布利希在六大开幕前 5 天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亲自指示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Hermann Matern）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中国代表团退场的局面。而如果中方在会上攻击南斯拉夫，会议主席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27、333 页。

^② 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在 1950 年 11 月率中共代表团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控诉美国，并因而在国内外声名大振。

^③ 赵毅敏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参加了 1962 年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82-183 页。

^⑤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告代表团名单和离京赴德日期》，1962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⑥ 同注^④。

团需要立即介入,同时切断会议转播设备的信号。^①

在15日上午9点的开幕式上乌布利希作了长达5个半小时的报告,在第二部分“我们怎样估计今天的国际局势”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了国际共运的问题。与此前的捷共十二大等会议一样,报告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同时含沙射影指责中共是“站在阿党背后的人和支持阿党的某种势力”,“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正在把教条主义观点强加于人”。而统社党“全力支持赫鲁晓夫和苏共,坚决拒绝对他们的污蔑性攻击”。^② 这里对中共的指责仍然是间接的,与统社党以往的表态区别不大。

除了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责,乌布利希还把对中共的批评扩大到了国家关系领域,即指责后者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相关做法。事实上,中印边界冲突已成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外交的一次重大考验。苏共在1962年底,即在统社党六大召开之前就已公开批评中共的“冒险主义”,并表态要向印度提供军事设备。^③ 而在六大召开之前,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统社党中央和民主德国外交部有关中印边境的地图是有利于中国一方的,这客观上支持了中方的立场,因而受到了印度外交部的抗议。然而,另一方面统社党又不得不考虑印度这个对民主德国获得不结盟运动国家承认有重要影响的伙伴,因此一直没有公开表达过民主德国到底站在冲突的哪一方。统社党的做法非但未获得中共的善意回应,还得罪了印度方面。例如,印方在1962年年底向全世界104个国家寄送附有尼赫鲁的亲笔书信和边境地图的中印冲突文件时,却并未寄一份给东柏林。^④ 直到1964年之后,民主德国才开始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明显偏向于印度一方。^⑤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乌布利希打算借六大这一兄弟党内部协商的机会在阵营内部对中共进行规劝,阻止中印矛盾继续升级,避免再次导致民主国外交的困境。所以,乌布利希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同各党不商量,也不通信息”^⑥。他试图使中共理解,“中印边界冲突有害于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体系

^① „Dokument 35: Reinschriftenprotokoll Nr. 57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vom 10. 1. 1963“, in 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 128.

^② 中共代表团:《乌布利希报告中攻击阿党、我党及其他情况》,1963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③ 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79页,这里第75、78页。

^④ Johannes Voigt, *Die Indienpolitik der DD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Anerkennung (1952-1972)*, Köln: Böhlau Verlag, 2008, S. 356.

^⑤ Hermann Wentker, *Außenpolitik in engen Grenzen, Die DDR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1949-1989*, S. 287-288.

^⑥ 这一点其实也是乌布利希在1962年12月14日同来访的印度共产党主席什里帕德·丹吉(Shripad Dange)谈话中所提到过的,参见 Johannes Voigt, *Die Indienpolitik der DD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Anerkennung (1952-1972)*, S. 357.

的利益”，并“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希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遵守和平共处原则”。^① 乌布利希的表态多少包含着一些个人情绪。因为一个月前，外交部副部长塞普·施瓦布(Sepp Schwab)刚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表示过，“不要讲冲突是由中国的挑衅而导致的”。^②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乌布利希并非是偏向印度一边刻意指责中国，而是更多地强调内部协商和避免危机升级的重要性。只不过乌布利希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自 1962 年年底欧洲各国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中共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

乌布利希的指责还萦绕在中共代表团的耳边，16 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的长达 2 小时 45 分钟的讲话，提出了停止公开争论的呼吁。这一讲话内容完全出乎中共事先的预料。中方对讲话进行分析后认为，赫鲁晓夫“并未指明攻击中共，且指名攻击阿党时的调子也比较一般”。^③ 但所谓“停止公开争论”的呼吁是其虚弱性和狡猾的迂回策略的表现，“企图以团结旗帜争取中间派，诱惑左派，以求进一步孤立我党，准备将来公开破裂时将责任推到我党身上，值得充分注意”。^④

此时中共将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的讲话看做是在相互配合，即一方高举团结和解的旗帜，另一方则对中共进行公开批评，以此来获取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公共舆论的支持，并将分裂的责任归到中共的身上。^⑤ 但笔者并未在已开放的中、德、苏三方档案中找到这种德苏密谋的直接和具体证据。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德苏主动故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讲话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正如上文所说，此时统社党对中共的政策比较复杂。统社党之所以批评中共，一是由于在内政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已经和中共渐行渐远；二则是表达对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不满。但即使如此，统社党的批评也是有限度的。因为西方世界的各大媒体和联邦德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密切观察这次会议及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内斗的情况，并准备对民主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不和进行大肆宣传，给民主德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大会

① 此外，统社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弗雷里希在大会上发言时，还不指明地攻击了“纸老虎”的观点，参见中共代表团：《乌布利希报告中攻击阿党、我党及其他情况》，1963 年 1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② Johannes Voigt, *Die Indienpolitik der DD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Anerkennung (1952-1972)*, S. 358-360

③ 中共代表团：《致词中增加一段文字的措辞》，196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④ 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196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⑤ 主要参见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58-760 页。

本身的进行制造混乱。^①

在这种情况下,统社党十分害怕中共在大会上进一步扩大分歧。因此在赫鲁晓夫讲话后,大会的国际问题委员会专门举行会议,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表示对赫鲁晓夫建议的支持。此后,国际问题委员会主席赫尔曼·阿克森(Hermann Axen)和统社党中联部部长彼得·弗洛林(Peter Florin)主动来找伍修权,以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为由要后者在致辞中回答赫鲁晓夫的建议。而中方发表讲话的具体时间统社党也“愿意照顾”。^②

中共之所以会认为德苏之间存在主动相互配合的密谋,主要是由于一直以来及会议期间中方所观察到的苏德亲密关系,以及中德、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隔阂。例如,统社党每天都把参会代表团安排到国务委员会大厦共进午餐。苏共、东欧和蒙古代表团的第一书记坐在主宾席上,而其他代表团却被安排坐在散桌席上。此外,统社党官员都陪苏共代表团坐在一起,而中共代表团则无人作陪。中共代表团认为“这包含了统社党中央的某种政治意图”。于是,从大会召开的第二天起中共代表团改到中国驻德使馆吃午饭,“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③但中方观察到的上述情况不能构成所谓德苏密谋的直接证据。

无论如何,在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讲话后出现了一种自中苏分歧公开以来中共尚未遇到过的复杂情况。中方原本准备了一段回击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的发言内容,现在看来也不再可行。^④中方发现,在上述两人讲话后,“现在许多中间派的党都有强烈的团结愿望,左派各党中也有不少人担心破裂”。^⑤中共甚至认为,“估计赫集团将迫使更多兄弟党代表团在大会上表态,拥护赫的建议,胁其多数,造成声势来压我”。^⑥而阿克森的国际问题委员会“显然是为作出谴责中共破坏团结和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的决议而设立的”,“赫集团纠集其仆从发表谴责我党和支

① 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Botscha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R, Berlin, 27. 6. 1963, SAPMO-BArch, DY 30/3607/01/083;《德党六大攻击我党的情况》,1963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② 中共代表团:《阿克森约见我团长谈话情况》,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Aktenvermerk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dem Leiter der Delegation der KP Chinas zum VI Parteitag der SED am 16. 1. 1963, 17. 00 Uhr, SAPMO-BArch, DY/30/3067/01/004。

③ 中共代表团:《德党大会花絮一则》,1963年1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④ 中共代表团:《致词中增加一段文字的措辞》,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⑤ 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⑥ 中共代表团:《大会情况》,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9-02570-01。

持有者的联合声明或其他形式的文件也有很大可能”。^①

为此，中共代表团在当天晚上陆续约见了越南、日本和印尼代表团，“就赫讲话交换了意见”。^② 此后，中国、朝鲜和越南三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中国驻德使馆集中，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深入讨论。^③ 这次讨论的结果，则是将“尽可能地争取群众和向兄弟党代表团做说服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使其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作为重要的应对措施。^④ 之后，中共和朝鲜党代表团都采取了这一做法。^⑤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讲话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在收到代表团的的信息后，在 16 日晚 12 点向伍修权指出，“鉴于乌布利希报告中对中印边界问题上向我提出了新的攻击，中央决定在你的贺词中加上一段给予回答”。中央亲自拟定的这段话指出，“尼赫鲁政府受到了一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些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顾事实，颠倒是非”。中央指出，这些人对中国方面的看法和说明却“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是同尼赫鲁一起，参加了反华大合唱”。^⑥

中共代表团则认为，还是应该把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因为“赫鲁晓夫发言后，六大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团结旗帜的问题。而乌布利希在中印问题上对我进行的攻击，比较起来已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致词中以不增加有关中印问题的一段，以集中回答赫鲁晓夫的建议为宜。对乌的攻击，可采取其他方式回击”。^⑦ 中央在收到代表团的回复后，在 17 日晚上 6 点（北京时间）回电指出，“乌布利希既然在中印问题上攻击我们，就应回复。发去的一段仍应讲”。而且“讲话的时间越早越好”，“只许自己攻击别人，不许别人回答，是办不到的”。^⑧ 这样，代表

①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1963 年 2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② 中共代表团：《大会情况》，1963 年 1 月 16 日。

③ 此时仍不想在中苏分歧中选边站的越南劳动党，为了避免因参加此次在中国使馆进行的讨论可能会“给公众留下负面印象”，很快就离开了使馆。参见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 234.

④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年 7 月版，第 269 页。

⑤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各国对伍修权同志和赫鲁晓夫在德党代会上发言的反应》，1963 年 1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3381-02。

⑥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在贺词中增加一段中印边界问题的内容给伍修权同志的指示电》，196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⑦ 中共代表团：《建议集中回答赫建议问题》，1963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⑧ 中共中央：《中央对代表团 16 日 24 时请示电的复示》，1963 年 1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团只能表示“当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执行”。^①

中共在会议接下来的时间里采取了全面斗争的态度。18日上午伍修权发表了中共代表团的致辞。中方认为,自己在六大上为了获得发言机会受尽刁难,主要由于是个大党才获得了发言机会,^②即“代表团争取到了致词的机会”。^③但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统社党在赫鲁晓夫讲话后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主动前来邀请中共发表讲话。17日中午,德方正式提出,安排中共在18日上午9点致辞。^④

伍修权的讲话内容充满了激昂的斗争情绪。在致辞前,中共代表团事先做出了准备,通过新华社记者、使馆和代表团三个渠道散发致辞的各种外文稿。^⑤代表团甚至认为,“苏德已事先控制一批打手,包括日夫科夫、泽登巴尔、隆哥等,准备在我致词后进行围攻”。^⑥

伍修权致辞时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都在场。致辞中伍修权对统社党、南共和苏共都进行了批判,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进行了回击。^⑦当伍修权提到南斯拉夫问题时,六大执行主席、柏林市委第一书记保罗·维尔纳(Paul Verner)当即打断其讲话,并大声表示不能同意中共在六大上进行反南宣传,“乌布利希也在一旁附和”。^⑧

伍修权致辞完毕之后,维尔纳当场表示每个人都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而中共代表口头赞同实际上反对。因此,统社党抗议中共的挑衅,要同那些提出同样抗议的党团结在一起,坚决拒绝对南斯拉夫的污蔑和谩骂,“中国代表的讲话完全违背了兄弟党关系准则”。民主德国广播电台立即进行了广播,称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攻击兄弟党,会议主席当场作了驳斥,但广播没有公开中方讲话的具体内容。^⑨

伍修权的致辞直接打乱了统社党对六大的部署和会议议程,西方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⑩统社党高层显然没有料到中共会作出如此强硬的表态,也担心事态扩大而被西方利用。因此,政治局委员赫尔勃特·瓦恩克(Herbert Warnke)和卡特恩在当天午后的讲话中,都对伍修权讲话表示遗憾。虽然卡特恩表示统社党在

① 中共代表团:《我代表团十八日致词》,1963年1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② 笔者采访梅兆荣记录,2015年5月26日。

③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④ 同注①。

⑤ 同注③。

⑥ 中共代表团:《伍修权同志致词时会场情况和代表团对斗争发展的几点估计》,1963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⑦ 致辞主要内容,参见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761-764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同上。

中印边界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和中共意见不一致，但强调“不要分裂、要团结”，“我们不愿牵入到这个争论中去”。^①

伍修权致辞后，赫鲁晓夫曾召集几个党的代表团秘密开会商讨对策，中共认为这是“频繁进行着串联活动”，并“组织了若干会议，布置反击”。^②事实上，乌布利希在 18 日下午的总结发言中相当克制，并未再提及中德之间存在分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中印边界问题。以至于中方认为，“这是吞下了我致辞中的坚决回击”。相反，乌布利希却强调“大会体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西方想在我们这里找分歧的努力没有兑现，他们为自己的分歧已经够忙。我们这里即使有不同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澄清，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我们同中国同志是有分歧，但还是令人寄予希望。为了国际共运的利益，也为了能干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一向同中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③

对此，中共则继续从斗争的立场出发观察统社党的行动，完全陷入到了对立情绪中，不能理解在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问题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统社党和民主德国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统社党和苏共的区别。因此，中国代表团除了随行工作人员外，并未出席乌布利希的总结发言。中方认为，从乌布利希的总结来看，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已使“赫集团及其一伙处于被动，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已取得初步胜利”。中方尤为注意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显得心情沉默，一直在出神”。^④

在中共代表团拟定的会议最后几日的行动计划中，中方只参加 21 日下午的闭幕式，不出席当晚的招待宴会，以此“作为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一个行动表现”。^⑤乌布利希在闭幕式的讲话，竭力展现六大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努力想在这次会议上发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的愿望落了空”，他还呼吁中共，“为了国际共运团结的利益不要再进行公开争论”。^⑥

尽管全场与会代表对乌布利希的闭幕词多次起立鼓掌，但中共代表团从头到

^① 中共则认为这些表态“软弱无力、心虚得很”，参见中共代表团：《十八日上午德党大会发言情况》，1963 年 1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② 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 765 页；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③ 中共代表团：《十八日下午德党大会情况》，1963 年 1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④ 同上。

^⑤ 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最后行动计划》，1963 年 1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⑥ Dokument 39: „Schlußwort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zur Diskussion über die schriftlich vorgelegten Berichte, über das Programm und über das Referat“, in 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 135.

尾不起立,不鼓掌。而在会议结束高唱国际歌时,中共代表团起身离开会场。^① 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认为,这样的行动在大会上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明显地影响了会议的“圆满”气氛。稍后德方邀请中方参加的招待酒会、音乐会和展览会等,中方也没有出席。^②

中共代表团还拒绝了统社党一起乘坐泽登巴尔专机回国的安排^③,而是乘飞机经莫斯科回国。^④ 尽管如此,统社党前来送行的官员在机场仍表达了同中共和解的希望,“这次党代会是解决矛盾的起点,希望在这个起点之后就是春天”。^⑤

三、六大后中德的公开论战及其影响

六大结束后,中共和统社党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公开论战。1963年2月9日,驻德使馆在给中央发回的分析意见中指出,六大是个“反华的大会,反阿已降为次要地位。反华气焰达到了历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会议的顶峰”。^⑥ 20日,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也指出,“深刻体会到中央指示的正确。对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妥协退让来求得缓和”。^⑦ 这些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苏联大使时(伍修权也在座,并会偶尔补充和评论^⑧)表示,他对赫鲁晓夫在统社党六大上提出停止论战,但同时又公开批评中共的做法感到“不满意”,认为,“索性进行公开论战,天塌不下来”。^⑨

① 中共代表回答国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从来是唱国际歌的,但我们对国际歌的态度是严肃的,不能同共产主义叛徒铁托分子一起唱国际歌”。参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② 统社党为了防止中国在酒会上采取行动,仅发给中国代表团3个成员请帖,中国大使、记者和随行人员均未收到请帖。参见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764页;中共代表团:《二十一日晚德方举行酒会》,1963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720-03;中共代表团:《德党大会二十一时十四时半结束》,1963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③ 此时泽登巴尔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意识形态分歧中站在苏共一方,被中共视作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员——笔者注。

④ 中共代表团:《代表团定二十二日离德飞京》,1963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⑤ 为中方送行的包括政治局候补委员雅鲁文斯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柯尔特(1964年出任驻华大使)、司法部部长本雅明以及一直陪同中方的空军司令凯斯勒中将,参见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我代表团离柏林时的情况》,1963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70-01。

⑥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1963年2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⑦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⑧ 苏联驻华大使馆:《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63年2月23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第25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95页。

社会主义阵营分歧公开后，中共还未曾在党报上公开发表过直接指责统社党的文章，这多少为双方的关系改善留有一些余地。而统社党六大上双方的斗争，以及毛泽东的必须对公开攻击予以公开回答的指示，使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民日报》在会议结束后的 1 月 27 日头版上发表长篇社论，用大篇幅公开与统社党展开了论战。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在该文发表前曾亲自进行审定，并表示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①

这篇文章并未回应统社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攻击，而是将重点集中在国际共运团结和分裂的问题上，认为统社党六大是“制造分裂、扩大分歧的亲痛仇快的事件”，“面临着美帝和西德军国主义威胁的民主德国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团结是假团结”，并将“攻击中共”等作为苏东共产党搞分裂的罪证。文章还指出，“国际共运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团结正遭受严重的威胁”。^②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统社党非常重要。2 月 12 日乌布利希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指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我们党生死攸关”，“希望中共不要继续进行公开的争论，并在语言和行动上都接受很多兄弟党都认同的赫鲁晓夫的建议”。他将《人民日报》的文章称作是“侮辱性的”、“采用帝国主义媒体常用的诽谤式攻击”，“中共开创的这种方式不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③

但此时中共已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而且在斗争中“绝不能迎合修正主义”。^④因此，乌布利希信的内容“并不重要”，^⑤反倒成了中共对统社党进行批判的又一个理由。在 3 月 27 日给统社党的回信中，中共再次对统社党及“六大”这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会进行了批判。^⑥

这些公开相互指责给外界提供了中德关系恶化的直接证据，而中共在德国民众中的宣传活动，则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上文已提到，统社党六大期间中国使馆成了以中共为代表的国际共运“左派”力量的集中地。此外，会议期间中国驻德使馆就已经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亲华人士等散发印有中方意见的印刷稿。而会后中共正式将“在德国群众中做工作”视作对德斗争的重要手段，加大了对民主德国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337 页。

② 《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载《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③ Ulbrichts Brief an Mao Tse-tung, 12. Februar, 1963, SAPMO-BArch, DY 30/3607/01/007.

④ 李丹慧：《关于 1960 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第 115-116 页。

⑤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德党中央致我党中央信的译文》，1963 年 2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⑥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德国统一社会党 1963 年 2 月 12 日来信的复信》，1963 年 3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民众进行宣传的力度。驻德使馆的一份材料显示，“来使馆要材料的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是高级干部的家属。德外交部对我散发我代表团讲话稿已正式提出警告，我新华社德籍雇员突然向我提出辞职，说明分歧太深，在留学生中也已开始发生尖锐挑衅。”^①

驻德使馆承认，对民众进行宣传的做法使得“我们在这里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和绊脚石，估计德方可能在国家关系上作文章”。为此“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作工作。他们最怕我们发材料，发材料要注意稳妥，多做口头宣传，多介绍人民听北京外文广播，通过左派作工作，通过亚非拉学生工作，革命的影响，修正主义者是阻止不了的”。^②

这样的宣传攻势导致了民主德国国内和统社党党内观点的混乱。例如，伍修权致辞后，一位民主德国老教授、冶金专家特别邀请中国研究生在饭馆谈话，说中共是正确的，统社党中央是错误的。此外还有几名德国人到中国使馆做了同样的表示。^③

统社党对中共的宣传攻势非常不满，对其在德影响甚至感到恐惧。它一方面告知中国使馆这样做的“不可允许性”，并在德通社上发文指责中共的行为“违反现有规定和法律条例”。^④另一方面又指派国安部门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材料主要是有关中共对国际共运的观点和“对兄弟党领导人诋毁”的内容，由北京的出版社、书店和电台直接寄送或经中国使馆散发给民主德国的民众和在德外国人（尤其是来自亚非国家的留学生）。^⑤此外，中共还在德国隐蔽地招募亲华派人员。而尤为让统社党不想看到的是，联邦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等情报机关利用中苏、中德的分歧，大规模复制中国的这些材料，并直接将其寄给统社党和民主德国政府官员。统社党还发现，联邦宪法保卫局甚至可以从北京直接获得这些材料。^⑥因此，民主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对民主德国民众与中国使馆的交往进行限制。^⑦

统社党六大上的交锋加上这场宣传和反宣传战，使得两国两党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对立的气息弥漫在双方的交往中。在这股强烈的斗争情绪影响下，中共完

①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

② 同上。

③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④ 驻德使馆则表示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参见《我驻德大使馆发言人驳德意志通讯社》，载《人民日报》，1963年6月25日，第1版。

⑤ 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Botscha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R, Berlin, 27. 6. 1963, SAPMO-BArch, DY 30/3607/01/082.

⑥ 同上, DY 30/3607/01/083.

⑦ Martina Wobst, *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 China*, S. 64.

全将统社党视作苏共的打手，认为“这次大会虽暴露出德苏之间有矛盾，但在目前情况下，德领导还是要跟着赫鲁晓夫走的”。民主德国“国家不大，但大国主义却极其严重。帝国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影响最深，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在他们身上逐渐消失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极端损人利己的性格逐渐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①而对于六大的具体成果，中共则提得很少。中共认为，大会“选举干部不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是以经济技术知识为主要标准”，“说明亲苏反华的积极分子得势，体现了统社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便于乌布利希控制中央，独断专行”。^②

与此相比，统社党尽管没有强调和中共斗争，但为了稳定国内民众，六大后统社党在全国各地区传达“六大精神”时，都谈到了六大的过程和“中国同志问题”，并且以此为主题举办了数十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民主德国普通民众从基层官员那里得知情况后，“对此很愤慨，认为中国愈来愈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南斯拉夫却愈来愈接近社会主义阵营”。^③很多基层普通党员表示，“中、朝、越、古巴走的是另外的道路”。^④

中德两党的公开争斗，不仅使得联邦德国有机可乘，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孤立民主德国，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与民主德国在国家关系领域中的合作。为了邀请中方派团参加 1963 年莱比锡春季博览会，民主德国驻华大使和商务专员曾多次向中国政府部门表示，“你们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展出可以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中国的力量。对我们签订对德和约和解决柏林问题也将起到重要作用”。^⑤但中方不仅没有参加当年的春季博览会，对于德方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同年举行的秋季博览会并签订进出口合同一事，中国政府也都予以拒绝。^⑥

双方的争论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德在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此时尚有少数民主德国专家留在中国工作，但这些人却直接卷入到了与中方陪同官员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例如 1963 年 2 至 3 月间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进行设备安装调整的民主德

①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

②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研究室：《驻德国使馆对德党“六大”选举问题的看法》，1963 年 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2569-01。

③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朝鲜使馆同志谈的一些问题》，1963 年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720-03。

④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朝使馆向我谈的几个情况》，1963 年 1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720-03。

⑤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国展览部候法曾副部长与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商务专员鲁威希的谈话记录》，1962 年 11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3380-01。

⑥ 中国对外贸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致民主德国对外和东西德贸易部信》，1963 年 7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3380-01。

国专家“大肆宣传战争的可怕性”，并批评了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而中方则指出了正义战争的重要性和“帝国主义欺软怕硬”，表达了对在中印冲突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乘机攻击和诽谤我们”的不满，同时还推荐专家阅读中共在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新发表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文章。^①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在经贸技术领域的合作气氛也变得非常紧张。此后中国管理部门也对中方人员出席民主德国驻华机构所主办的一系列工农业产品展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作出了专门指示。^②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德社会和人员交往也受到了巨大阻碍。例如，上海某研究人员和其民主德国女友保持了6年的通信来往，尽管双方“只说私事和互相送礼物”，但这种行为受到了上海市委的批评，认为其“乱搞男女关系，小偷小摸严重，对外国表现热情”。^③可以说，到1963年年底，中德之间的党政、经贸科技和社会文化交往已经全面陷入困境，中共高层已将民主德国的关系视作是中欧外交关系中“最差的”。^④

中德矛盾的加剧和双方的公开争论，实际上对苏联有利，加强了苏共与统社党的合作。苏共认为，中共指责某个党没有独立性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其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以孤立苏共，使其面对面同苏共展开论战。^⑤但几年前还被苏方视作是中共重点争取对象之一的统社党，^⑥短期内看起来很难恢复与中共的合作。2月22日，苏共将其致中共的信转发给了统社党，并表示“苏共满意地发现，统社党和苏共长期以来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流，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紧密的关系”。^⑦

四、结 语

有德国学者认为，中苏分裂后统社党必须在中苏之间选择其一，而取消对苏联

① 尽管如此，德国专家最后还是成功完成了此次安装任务，参见上海市委科技委员会：《专家工作室活动和工作简报》，1963年3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A52-2-217。

②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关于民主德国领事馆与我所人员同2次电话的情况报告》，1963年1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A52-2-217。

③ 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王某某与民主德国女友通信问题的情况汇报》，1963年11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A52-2-217。

④ 中国外交部办公厅：《邓小平会见黑根谈话记录》，1964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9-03919-03。

⑤ 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1963年5月17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第47-67页。

⑥ 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09页。

⑦ Schreiben der KPdSU an die SED vom 22. Februar 1963, SAPMO-BArch, DY 30/3067/01/033.

的依靠对统社党来说是政治自杀。^① 的确，统社党对苏共的依赖是全方位的，很难再有其他选择。但包括柏林墙修建等 50、60 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统社党与苏共政策还是存在着区别和矛盾，并且时不时扮演着“尾巴摇狗”(the tail wagging the dog, 喻指从属地位的势力执掌指挥权)的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苏联的对德政策。^② 同时德国学者的上述看法还忽视了统社党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政策的复杂性。六大召开前，统社党在内政和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上已经和中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和矛盾。到会议召开时，这一矛盾公开爆发。统社党对中共的批评，主要是从中共与统社党自身利益和政策相关的矛盾处出发进行的。没有苏联的指挥，统社党和中共的矛盾也会爆发。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但民主德国作为一个小国、统社党作为一个小党，在内政外交问题上极度虚弱，难以完全和中共决裂。因此，其在六大前后一面与中共进行论战，另一面又尽量维持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两国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以防国内的混乱和西方阵营乘机利用。

在中苏矛盾越发加剧的情况下，中共不仅一开始就认为统社党是苏共的“附庸”，还把后者的国内政策也看作是陷入了“修正主义泥坑”，对于统社党六大也是以强硬的斗争姿态前往参加的。因此，在六大上赫鲁晓夫发表和解的讲话后，中共表现得难以适应，同时也忽视了统社党在会议上所体现出来的妥协以及在外交上虚弱的一面，反将其视作是“狡猾的迂回策略”，过度地强调了斗争而没看出苏德之间的区别。而作为代表团团长的伍修权，尽管曾在 1962 年和王稼祥等人一起向中央提出过要避免中苏斗争继续尖锐下去的建议^③，但其在六大上的表现却加剧了中德及中苏之间的对抗。

六大后双方争斗的继续，以及中共在民主德国进行的宣传战进一步恶化了两国的国家关系。这场兄弟阋墙使双方在党政、经贸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上均陷入困境，这对原本还对中德往来存在疑虑的苏联实际上是有利的。这种状况，直到 1963 年底毛泽东提出“豺狼当道、焉管狐狸，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从而将斗争矛头重新指向苏共之后，才开始发生改变。^④

责任编辑：李乐曾

^① 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 67.

^② 对于这个问题的著名研究，参见 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Berlin: Propyläen, 2011.

^③ 萧冬连：《筌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第 134 页。

^④ 参见陈弢：《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 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57-64 页。

Eine Analyse des deutschen Berufsbildungsmarkts
— **Einige Denkanstöße für die Entwicklung eines modernen**
Berufsbildungssystems in China

Li Jun

In der vorliegenden Untersuchung wird der deutsche Berufsbildungsmarkt analysiert. In der modernen Berufsbildung spielt der Berufsbildungsmarkt eine bedeutende Rolle, über den der Bedarf zwischen Auszubildenden und Betrieben kommuniziert wird und gesellschaftliche Ressourcen alloziert werden. Der deutsche Berufsbildungsmarkt weist Merkmale sowohl des Arbeitskräftemarkts als auch des Dienstleistungsmarkts für Berufsausbildung auf. Aber dieser Arbeitskräftemarkt ist kein perfekter. Und der Berufsbildungsmarkt wirkt anspornend und integrierend auf alle Beteiligten. Dadurch wird die Qualität der Berufsbildung erhöht und der Übergang von Schule zu Beruf erleichtert. Einige Faktoren sorgen gemeinsam für das Funktionieren des gesamten Systems. Dazu zählen u. a. ein breit akzeptierter Standard für Berufsbildung, ein System von Interessenvertretung und Zusammenarbeit, gesetzliche Rahmenbedingungen und die Institutio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Auf der Basis dieser Analyse werden einige Vorschläge zur Entwicklung eines modernen Berufsbildungssystems in China unterbreitet.

Der Bruderzwist von 1963 :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vor und nach
dem 6. Parteitag der SED und deren Nachwirkungen

Chen Tao

Der 6. Parteitag vom Frühjahr 1963 markiert den öffentlichen Bruch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r SED. Die Chinapolitik der SED war nicht ganz von der KPdSU gesteuert und eher auf eine Reihe von schwerwiegenden Dissens über inländische wie internationale Angelegenheiten zwischen der SED und der KP Chinas zurückzuführen. Die Differenzen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DDR sowie die Schwäche der letzteren nicht zur Kenntnis nehmend, entschied sich die KP Chinas für den Kurs der direkten Konfrontation. Der Bruch der beid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wirkte sich nicht nur schwerwiegend auf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aus. Er begünstigte auch die Sowjetunion, die nicht ohne Bedenken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Kontakte verfolgt hatte, und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KPdSU und der SED.